

父亲母亲的罪与罚之后

□王蒙

父亲王锦第，字少峰，1947年去解放区的时候还用王曰生的名字。生于1911年春天，属猪，与民国同岁。去世于1983年早春，应该是三月。

我不了解他，整天与我在一起的家人有妈妈、二姨、姥姥、姐姐、妹妹、弟弟，但是没有他。他基本上不像是我的家人。对于我来说，很多时候，他是神出鬼没的。我仍然记得的是，他见到我们孩子的时候现出由衷与慈祥的笑容，他说话南腔北调，他没完没了地对我们训诫，现在的话叫启蒙：要挺胸，不要罗锅，见到人要打招呼，要经常用礼貌用语说“谢谢”“再见”“对不起”，要锻炼身体，要吃鱼肝油丸，要洗澡和游泳，长大了男孩要服兵役。从他的训诫中，我获益其实很多。但我早就有体会，母亲是为我们操劳，他是对我们意欲有所教导，但我的反应是觉得可疑。

他常常不在家。母亲给他起的代号是“猴儿变”，说他像一只猴子一样，动辄七十二变。

1949年以后，在我的帮助下，他完成了他自己前半生的一大心愿，与母亲离了婚。我也与他有了更多的接触，有时是长谈。他的再婚很难说带来了任何人生的起色。这与“五四”后的一批文学名著的提示不同。名著告诉我的是，摆脱了封建婚姻，获得了自由恋爱择偶，就一片幸福；我从他身上体会到的则是幸福的前提比仅仅自由恋爱要全面得多复杂得多吃力得多。

我的结论是，父亲是个理想者、追求者、失败者、空谈者、一事无成者、晦气终生者，我最反感的是他对我的诉苦。在我的父母身上我看到了，我极端热爱的“五四”新文化带来了伟大的希望，同时也带给了另一些人以极端的上下够不着、左右都为难的撕裂与活活绞杀的痛苦。

我母亲董敏的认识有更为深刻之处。她认为她的最大痛苦是知道了“五



王锦第先生和孩子们(其中男孩为王蒙)

四”新文化，然而，她不是宋庆龄，不是谢冰心，她只能踩着缠足后释放的两只“解放脚”，无助无路地承担封建主义包办婚姻的一切罪与罚。故而她的一生只有愤怒、冤枉与对父亲的咬牙切齿。

如果说我的小说《活动变人形》的主人公倪吾诚的原型是父亲，我只能为他感到羞愧、怜悯、轻蔑、刻骨铭心的痛惜，还有无奈和对自己这一代的些许骄傲。写他暴露他的儿子的光明底色与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与父母的罪与罚，成为过分鲜明的对照。

都写到《活动变人形》里了。那一代人的狼狽尴尬，我认为历史与社会的造孽，他们这一代人的悲剧是我从少年时代坚决追求革命的一个重要的基点，而我的做人处世，必须以老爷子为反面教员。要脚踏实地、要节制自我、

要反求诸己，尤其是，一生不做伤害女性的不负责任的事。当母亲在父亲去世时向我宣称他的离世是“除了一害”时，我为母亲难过。

问题是，后半生，父亲自己随着年龄的增长，也愈益自惭形秽，同时牢骚满腹。整天宣称自己在大学里与同事们在一起，他的地位是“次小尼姑”——语出《阿Q正传》，不想再做什么解注。他说往后他只能做“家庭男主”。问题是他在庶务上的拙笨与无能，更胜于其他，我完全意识到他做不成男主，只能是神经男、混乱男、饥渴男。我的感觉是他后来完全脱离了生活，也被生活所抛弃。他在“文革”中被宣布无权参加“文革”，我甚至有理由怀疑，他如果参加“文革”，也许会成为一个过激分子……他经常说什么“藏污纳垢”，还有

新生活新社会的建立要几代人的时间。

但他仍然有一些知识，他教给我的仍然不少，我见到的第一个共产党人，是他带到家里来的。他给我讲关于老子的“天道”“人道”与农民起义的“替天行道”的口号；针对少作“年轻人”，他提出要理解领导干部“医心如水”的某些心态；关于列宁论唯心主义是“不结果的花”；关于“家大舍小令人家”的称谓——我才做到了从不闹“你家父”的笑话。还有对营养的口头重视，对西餐的正面评价，对游泳的入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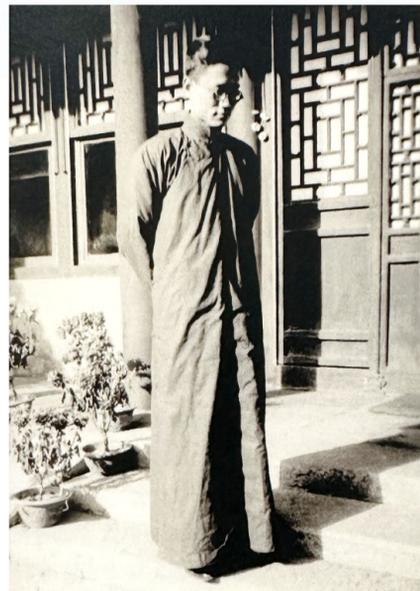
而且，一个现象我早已发现：《活动变人形》的读者与观众（已作为话剧立在舞台上），面对我的无情的对作品主人公的非正面描写，更多的是同情，不是唾弃。

近年来，则是学界的一些人士，渐

渐发现了王锦第，发现了他对中德学术交流的贡献，发现了他的某些著述，甚至还有新诗与散文。

我引为知音的上海复旦大学部元宝教授，甚至找到了他的数量不少的译著文字，将之编辑成书。我读之大惊：一、我怎么不知道？二、他怎么从来没说过？三、他的译著与诗文，竟有一定的质量吗？

童年时期，我记得他失去了高级商业学校的职位之后连夜译书的情景，我翻阅他的译稿，全然不解，只觉得咄咄逼人，不是人话。而他应范文澜老师之邀去位于邢台（顺德府）的北方大学数年后，随解放军入城回到北京，他竟然没有入党。这更使14岁的地下党员王蒙无法不相信，他革命的结果多半是并不入流。



1940年代，王锦第先生在北平寓所

我想起了他与德国汉学家傅吾康（Wolfgang Franke）的友谊，但老爷子年轻时拼过的德国哲学我大外行。我猜测他算是赶上了前所未有的变局、此起彼伏的变数。后来，他似乎否定了他翻译海德戈（应是海德格尔）、士塔格（施普朗格——哲学家、教育家，曾被誉现代教育之父）、胡塞尔（哲学家、散文作家）的著述的价值，他否定了他自己的前半生，他在他的儿子王蒙面前更不想说他留下过什么文学痕迹，虽然他念念不忘在北大上学时，与他同室的李长之与何其芳，甚至于，李长之还著文称赞过他的诗作。而王蒙，长期以来听到他的室友同学名字的时候，浅薄势利的反应是：“原来，就属你没什么出息。”

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1983年他去世后，我曾多次梦见双目基本失明的晚年的他，在晚间，在胡同里蹒跚独行。后来，这样的梦也就消失了。他已渐行渐远。此次从《王锦第文录》清样中，读到他在一篇散文里写到（从日本经韩半岛）留学归来，见到了兰（母亲）和酒（姐姐）蒙（我）的微笑，使他开心。此外，到生命结束时为止，他一无所有，一无所成，不被各方面各亲属所承认，受到了种种抵制。

突然，近几年，先父开始有了一点咸鱼翻身的迹象。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叶隽先生发表文章，肯定了王锦第对中德文化交流的贡献，肯定了王锦第作为学人的存在。部元宝教授也在他的两篇重读《活动变人形》的论文中，反复对比作为启蒙一代的倪吾诚与作为革命一代的倪藻在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若断若续的关系，因此也免不了为倪吾诚及其原型王锦第之间的某种显差而嗟叹不已。此时，他与后妻生的小儿子，已经自杀多年。是不是罪与罚仍然余波未了？

近来，在朋友帮助下，我证明了“我父亲是我父亲”，以我的长孙的名义领到了他与后一个妻子的安葬证；忙活了一阵子，在可预见的未来，免去了他们的墓地作为无主坟墓被平掉的可能。

历史和时间，慢慢会使万有各归其位。谢谢部老师，谢谢我的老东家人民文学出版社。有幸看到老爷子文录的出版，王蒙惭愧了。

1984年初夏，王蒙在武汉开始酝酿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1985年夏完稿，发表于《收获》1985年第5期（《当代》1986年第3期转载）。

《活动变人形》不仅是王蒙个人文学创作生涯的一座高峰，也是当代中国文学不可多得的经典之作。这部自传性长篇小说的问世，令王蒙生身之父王锦第首次得以借虚构人物“倪吾诚”的躯壳，重新浮出历史地表。然而当时绝大多数读者只知道小说人物倪吾诚关联着王蒙的父亲王锦第，对王锦第其人却知之甚少。迄今为止，人们谈论更多的还是以王锦第为原型而塑造的小说人物倪吾诚的形象。

时隔二十年，王蒙在长篇回忆录《王蒙自传》第一部《半生多事》（花城出版社2006年5月第1版）、第二部《大块文章》（同社2007年4月第1版）中再次提到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畸形而不幸的家庭生活，也再次说到他的父亲王锦第。

自传不再采用小说家言，完全出以纪实笔法，然而除了将小说虚构的一些人物、事件和历史情增加以还原、指实、补足，真实生活中的王锦第形象仍然未能脱离小说虚构的倪吾诚而宣告独立，只是进一步证实了小说叙事“所言不虚”。就连自传作者王蒙对其父亲的态度，跟小说家王蒙对其笔下人物倪吾诚的态度，也几乎如出一辙。

生活和历史中的王锦第继续虚构小说《活动变人形》之后，再次为高度接近小说的纪实之作《王蒙自传》中的父亲形象所收纳、所覆盖。倘若将《活动变人形》与《王蒙自传》相关章节放在一起看，读者很容易产生一种幻觉，仿佛果真是生活模仿了文学，而非文学模仿了生活。艺术形象“倪吾诚”诞生之日似乎就是王锦第真实面貌被遮蔽之时。

之所以有这种阅读效果，很大程度上乃是因为，跟小说人物倪吾诚一样，王锦第也是被作家王蒙所塑造所讲述的对象，他本人并未取得发言权。《活动变人形》与《王蒙自传》究竟多大程度上呈现了历史人物王锦第的生活真实？对于这个问题，最好的答案莫过于让王锦第本人站出来说话。但这位历史人物早已于1983年3月15日去世，再让他开口，岂非痴人说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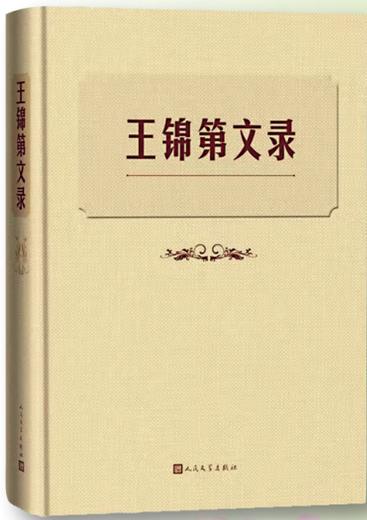
值得庆幸的是王锦第并非简单的历史人物，而是在中国现代学术史（某种程度上也是文学史）留下不少著述的学者与作家。倘若将他的文字收集起来，不就相当于给他开口说话的机会了吗？

这是我编《王锦第文录》最初的想法。王锦第的文章，方面甚广，本书大致将它们分为四辑。

第一辑是哲学、教育学论文以及随笔，包含王锦第对中国古代哲学家颜元、朱熹、王阳明

《王锦第文录》编后记

□部元宝



《王锦第文录》，王锦第著，部元宝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23年12月

和西方近现代哲学家黑格尔、赫尔巴特、雅斯贝尔斯、胡塞尔、海德格尔的介绍与评说。其中关于胡塞尔、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的论述，在中国现代哲学界属于开风气之先者。仅此一点，就应该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给王锦第保留一个相当的位置。

第二辑是西方现代科学、教育学、哲学、“文化形态学”论著的翻译，与第一辑相呼应。王锦第不仅是现代西方哲学、教育学和科学思想的研究者，也是在这三个领域勤奋耕耘的翻译者。他的研究工作直接以他人的译介为基础，并非耳食稗贩之谈。

第三辑，是关于日本文学、历史、制度及战时形势之研究，论述范围涉及日本的西化过程、明治时代日本思想界若干大关节以及战时日本政治、经济与外交，也包括日本文学（比如对《源氏物语》的介绍与翻译）。

第四辑杂撰，包括王锦第本人的少量诗歌、散文等。

王锦第（1911.3.27—1983.3.15），河北沧州人，字少峰（又字曰生），关于其先祖和家世生平，可参看《王蒙自传》第一、二部，此处不赘。1929年7月，王锦第考入北京大学，起初学理科（这大概就是文录中涉及不少自然科学的原因），1931年转入哲学系（与李长之、何其芳为

同学）。1935年从北大哲学系毕业后，入东京东亚高等预备学校。1936年至1938年在东京帝国大学大学院文学部哲学科学习。1938年夏回国，一度担任北京市立高级商业职业学校校长，此后又担任过北师大和北大讲师。为逃避家庭纠纷（夫妻不和），出走山东、江苏、在兖州、徐州短期任职，一度担任青岛李村师范学校校长。抗战胜利后回北平，不久便通过中共地下组织的安排，赴他的老师范文澜任校长的北方大学（邢台）任教。

在北京期间是王锦第短暂而高产的治学阶段，主要是与德国汉学家傅吾康等人合作编纂《中德学志》，译、著以德国近现代哲学、教育学、“文化形态学”为主，是中国现代最早系统介绍现代德国存在主义和现象学的先驱者之一。

王锦第的诗歌、散文、演说录、杂文也颇具特色。诗歌曾得到同学李长之的品评。散文不拘一格，有留学生生活和旅行活动的纪实，也有寄情山水的小品。杂文涉及鲁迅、郭沫若、闻一多、梁实秋等文坛健将。还有一些文章写于解放前夕的北方大学。1949年以后的文章目前发现的不多。

《王锦第文录》如何有助于复原学者和历史人物王锦第的真实形象？关于这个问题，长期研究中德文化交流的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

王锦第诗选

听：促织凄凄的鸣声。

一个正在重温旧梦的人。

听雨

深夜来了，
冷风和凄雨起了共鸣。
迢迢万里远隔山水
初来异地的陌生人，
独处在斗室中
听窗外雨滴与风铃的交响声。
九月二十二日

愁

狂风吹坏了电线，
灯光暗淡起来
窗外的老伙计说：
“灯也发愁了”，
可巧让隔壁失意人听去。

秋夜

月夜下
冷露湿了残荷。

乡思

今晚见到白云衬着夏月，
忽然想起：
暑中乡居时的蛙鸣，犬吠，更声，
还有母亲室中隔窗传出的蚊香。

独立行者

荒芜的古楼上，
一个孤游的人正在深思，忏悔，
老鸦叫了几声
飞向白云深处。

凉秋

秋雨下过去，
隔窗吹进了凉风
叫醒了

海上望月

海上的夜行者，
在甲板上贪看中秋的明月，
忘却添衣，
被秋风吹冷了，
但是唤我加衣御寒的母亲呢？
过濠户内海 船上
中秋节日，深夜

门司的月夜

水声与机轮交响曲中，
梦中醒来，
到了三岛国家的门户，
将沉海底的月色里
遥望下关与门司，
还可以照见依山而居的渔家。
九月十二日门司的岸畔

《王锦第文录》是一部独具特色的文史类资料汇编，我仅仅承担了初步的收集整理工作，后期精细校勘的任务更多落在人文社资深编辑杨柳女士肩上。王蒙先生以作者后人的身份授权出版该书，还欣然命笔作序，继《活动变人形》和《王蒙自传》后再次谈到他个人生命史上晦暗沉重的这一页。叶隽君长文《作为德系知识推手的王锦第及其在〈中德学志〉的著译》作为本书附录，有助于读者从历史（尤其中德学术交往史）角度感知王锦第作为学者的基本面相。疫情期间在东京大学访学的郑依梅博士找到了王锦第留学日本时期的原始档案，并围绕王锦第何时毕业于北大哲学系以及在日本的学籍问题、对旧说有所辨正。郑博士也允许我将她的考据文章编入本书附录。

对于上述四位师友所提供的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